

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笔谈(之二)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突围

□南帆

海量的网络信息与扑朔迷离的真相

当代的多数作家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对于文学的巨大影响。作家的灵感或者创作的题材可能来自互联网流传的一则消息,正如当年报纸的新闻给予的启迪;作家可以进入互联网收集必要的参考资料,搜索引擎指示各类知识仓库的所在,必要的时候,相关典籍迅速以电子书的形式传递;只要作家愿意,作品很快会形成“渊博”的风格,甚至可以在其中炫耀若干冷门知识。

各种参考资料不仅包含文字档案,而且配备众多实物图片,一个名词的背后附有实物图片即可权威地宣称“有图有真相”。“有图有真相”这个说法的升级版是视频资料,互联网时代业已造就一支视频制作大军,一部手机可以完成从拍摄到剪辑的所有流程。古人不得不跋涉千里,拜访一座名山或者一条河流,当代作家只要手握鼠标点开一段视频,一切尽收眼底。

各种小视频业已形成汹涌之势。五花八门的小视频多么有趣,各种视频APP似乎正在将文学杂志远远地甩在后面。恰是在这个时候,作家不得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另一面:互联网会不会垄断“真相”,从而对于文学形成遮蔽?如果承认另一些“真相”遗落在互联网之外,那么,文学必须承担一个新的职责——揭示乃至挖掘这些“真相”,并且展示出另一种异于互联网的文学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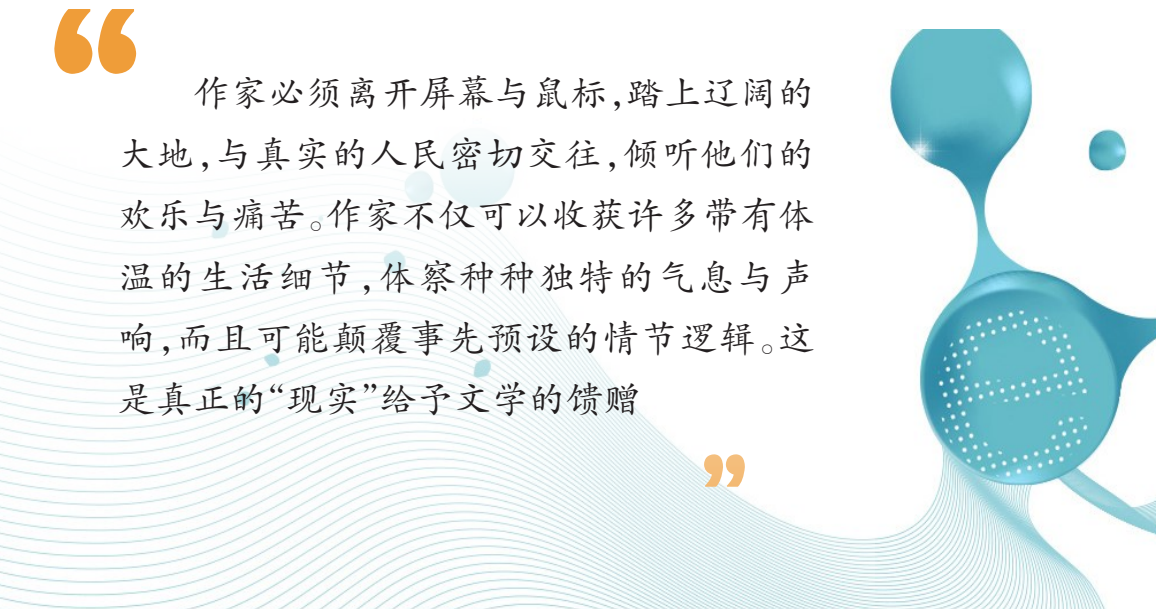
各种信息或者知识正在从四面八方涌入互联网。这些信息或者知识处于零散状态,而不是围绕某种主题或者某种中心形成一个有机结构。可是,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功能正在将大众裹挟而去,以至于这种零散状态无形地左右许多人的世界认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急剧增加,我们几乎无法窥见生产体系或者社会组织运行的全貌;每一个个体栖居于社会分工指定的一隅,社会总体的各个行业、各个层面之间似乎“形同陌路”。学者弗·詹姆逊曾经呼吁建立某种重新定位的“认知绘图”,然而,互联网似乎没有提供多大的帮助。三则段子、五段视频和若干似是而非的消息打发了一个上午,世界并未变得更清晰一些。

接受真正的现实给予文学的馈赠

能否对于人们的世界认知有所贡献?文学早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譬如现实主义。现今的“现实主义”概念不再单纯地始于19世纪的那一个文学思潮,或者异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某种叙事学,而是返回其初始涵义:关注栖身其间的这个真实世界。如何界定“现实主义”的“现实”——谁的“现实”?从“真实”标准的建构、主体哲学带来的认识论转折,到“语言转向”或者心理学视域的介入,“现实”不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然而,尽管这些理论辨析尚未完成,“现实主义”概念仍然如火如荼地展开。“现实一点吧”,这时所说的“现实”一词就是“现实主义”的“现实”。“现实”包围在我们周边,充满烟火气息,众声喧哗,悲欢离合,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故事层出不穷,同时又打上带有某种历史特征的印记。注视这一切,即已完成“现实主义”的初始涵义。

当然,在中国现代语境之中,“现实主义”的初始涵义的形成,包含了自五四时期以来种种文学论争背后的一系列共识。一些僵化的古典文学遭到了抛弃,五四新文学不再空洞地横山涉水,作家的目光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底层人民,转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些神魔鬼怪、飞仙剑侠的故事中,期待某个武功盖世的救世主铲除一切苦难,被现实主义作家视为一种虚假美学。总之,现实主义饱含投身于社会历史的激情,而不是耽于幻想,或者沉溺于琐碎的杯水风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观念根据历史状况有所调整,例如内涵更为宽泛的“人民”替代了“工农兵”。“以人民为中心”是将人民视为现实的主人公。人民创造历史,那些课堂上的教师、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医院的医生或者商务大楼里的企业家也是人民的一员。不论

作家必须离开屏幕与鼠标,踏上辽阔的大地,与真实的人民密切交往,倾听他们的欢乐与痛苦。作家不仅可以收获许多带有体温的生活细节,体察种种独特的气息与声响,而且可能颠覆事先预设的情节逻辑。这是真正的“现实”给予文学的馈赠



新的历史状况带来哪些新的历史认识,现实主义文学始终保持不懈的激情。

迄今为止,几个关键词仍然活跃在“现实主义”概念的解释之中:现实、社会、历史、人民,当然还有文学伴随的审美特征。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文学的世界认知也是如此。五四新文学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之中已经包含改造世界的强烈动机。

文学的世界认知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作家不能仅仅在互联网上认识人民。互联网可以搜索到种种提示,然而,这些提示未必是最重要的信息。通常情况下,微信朋友圈只能展示一个人的部分形象,这些信息并非品行鉴定的全部依据。一个人会将哪些信息公布在互联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信息公布意欲表明什么的同时,间接表明不公布什么及其背后的理由——不宜公开、不重要乃至回避什么。

所以,更多的时候,作家必须离开屏幕与鼠标,踏上辽阔的大地,与真实的人民密切交往,倾听他们的欢乐与痛苦。作家不仅可以收获许多带有体温的生活细节,体察种种独特的气息与声响,而且可能颠覆事先预设的情节逻辑。这是真正的“现实”给予文学的馈赠。互联网堆积了许多逗乐的小视频,以至于人们觉得生活之中的喜剧已经超载。严肃的生活怎么可能时刻在“搞笑”?这种状况毋宁追溯到互联网的大众传媒性质:娱乐为王。多数人没有兴趣把烦闷而重复的日常劳动发送到互联网。然而,作家没有理由忽略这些劳动。相对于小视频制作者的“机智”,文学必须“笨拙”地意识到,这些劳动还是历史创造的重要内容。无论描述个人的所作所为还是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些劳动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背景坚硬地存在。这是“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些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字,跌宕起伏,悬念丛生,但是,很多作品缺乏经典现实主义文学拥有的坚实纹理与历史感。文学的历史感指的是,作品的内容或者形式与历史的重大演变形成呼应,显现出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历史脉络。

突破信息茧房,写出文学的历史感

很大程度上,文学的历史感是突破互联网信息茧房的利刃。互联网已经形成这种功能:读者的查阅显示出哪一方面的兴趣,互联网会自动聚集大量相近的信息进行“喂食”。愈来愈多的信息恰是读者期待看到的内容,貌似客观的结论在信息编造的幻象基础之上自动生成。当然,多数作家具有预防小规模信息茧房的心理机制。可是,正如电影《黑客帝国》之中的“母体”那样,互联网可能形成某种巨型、以至于难以察觉的信息茧房。能否像《黑客帝国》的主人公那样冲出巨

型信息茧房,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重大的考验。

人工智能ChatGPT的文学写作证明了巨型信息茧房的存在。简单地说,ChatGPT可以吸收历史存在的一切文本,并且在如此强大的基础上构造新的文本。由于“深度学习”的能力,ChatGPT构造新的文本并非拙劣的模仿,而是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文学水准。一项有趣的文学实验是:提供10部文学名著的开头,邀请ChatGPT续写一段。必须客观地承认,ChatGPT续写的片段文采斐然。如果不熟悉这些文学名著的原文并且形成先入之见,很难说ChatGPT逊色在哪里。或许可以说,生产各种文学片段,ChatGPT遣词造句的写作能力丝毫不亚于通常的作家。当ChatGPT使用的语料库包含了互联网的全部资料时,出色的遣词造句可以完成无可比拟的模范文本——至少存在这种理论可能。一个作家只能活动于互联网某一个小小区域,他不可能横渡信息的汪洋大海,如同ChatGPT那样占领俯瞰的制高点。置身互联网的巨型信息茧房,ChatGPT占有的信息量是任何一个作家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ChatGPT的缺陷恰恰在于信息与遣词造句之外。至少在目前,ChatGPT无法像人类那样拥有自己的历史,并且与这种历史产生紧密的互动。ChatGPT无法根据自己的历史体验驾驭语料库。如果说,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感知可能因时而异,当下的得意或者失意可能改变过往的评价或者未来的期盼,那么,ChatGPT不会出现如此复杂的波动。ChatGPT存在未来的维度吗?“农民工”“外卖小哥”“妈宝”“大白”出现于汉语之前,ChatGPT不可能使用这些词汇造句。这些词汇的创造者只能是人类。独特的历史体验驱使人类创造种种相关的词汇,并通过作家书写种种相关的文学文本。缺乏“历史”的ChatGPT无法企及这一面。无论这些“历史”的内容是什么,它绝非事先贮存于互联网,而是始终包含“现在进行时的展开”。

作家与ChatGPT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们是现在进行时的组成部分,而且扮演主动者。他们不仅复述什么,重组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以及参与活的历史,刻画活的形象。对于文学来说,所有的信息都不多余,但是,陷入信息牢笼不可能产生一流的作品。古人说过种种睿智之言,例如“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此等等,强调书卷之外介入现实生活的意义。然而,互联网的功能如此强大,各种信息的收集如此方便,以至于一些作家开始遗忘反复阐述过的观点。只有置身于牢笼之外,才能察觉牢笼的存在;置身于互联网之外获得的观念是——互联网构成的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平台,而不能等同于更为宏大的现实本身。文学必须踏入现实本身,剥离互联网信息的既定叙述,进而展示自己的真正发现。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做人民的学生

先贤们曾经对比,指认李白仿若在人群之上、之外的“天上”写诗,走超拔脱俗的“仙人”路线,“云端感”强,而杜甫则是置身地面,在人群之内、之中用生命歌唱,把亲历的一些人、事写进诗歌。就这两类诗人而言,柯仲平无疑属于后者,他的诗歌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但有时候也带有李白式的激情。他不像有些诗人那样,过于强调自我,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沉溺于饮食男女、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的日常世俗吟唱。他的诗之所以能够进入成功之境,是因为他执着于“此岸”关怀。在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命题中,他自觉接受时代的选择,坚持民族、人民与革命的立场,这使他的诗和个人的闲适情调相去甚远。他早年在西安的一场文学讲座中说:“艺术是时代的、生命力的表现。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他的诗达到了这一状态。置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动乱的文化语境中,其视线与体验无法从现实领域移开,总是把“猛似狂飙烈火”的内心激情主动献给现实和人民。这恐怕也是一个大诗人的必然选择。具体说来,他的诗和他生命的经历到达了和谐状态,始终充满“革命”情结。据史料记载,他的一些诗歌曾经多次在延安时期部队战前动员时朗诵,的确起到了鼓动战斗激情和锐气的宣传作用。可见,柯仲平的很多诗都是和“革命”同呼吸、共命运的。他是一个用生命写诗的诗人。特别是他倡导鼓动且身体力行的那些“街头诗”,完全可以看成是从战争生活的土壤里绽放的精神花朵。如果回望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时局容不得娇媚柔婉的娱乐性诗歌生长,而需要“时代的鼓手”透出。在这样的时刻,具有强烈艺术良知的柯仲平写了很多关于生活与战场的诗歌。他那种激情似火、明朗雄健的声音,获得了特殊的效能。其诗歌对于力量与崇高因素的标举,在无形成了一种优质的选择。

柯仲平在写作中感觉到抒情短诗自身的缺陷,所以很早就进行小长诗的尝试,后来干脆转向叙事诗的创作。这种经历和追求充分体现了一种随时代语境变化而不断探索的精神。和诸多诗人一样,柯仲平也是从抒情诗写作走上诗坛的,当年他在家乡和初入大学时的一些短制就是证明。后来,在延安时期,仍然有一批优秀的短诗,情感真挚热烈,语言朴素有力。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自己的矫正与调整,后来逐渐从短制走向鸿篇,从抒情走向叙事。1924年写出抒情长诗《海夜歌声》;1928年创作长篇诗剧《火山》;1938年连续推出两篇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一首歌颂边区人民抗敌锄奸的事迹,一首反映了工人群众联合抗日的的生活。尤其是《边区自卫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地表现李排长、自卫队员韩娃等新型工农形象,传达出“人民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攻不破的铁壁铜墙”的主题,气势恢宏,关键是还能以诗人自己的视角、思维将切实具体的实情观照,上升、转化为诗情,保持比较理想的诗性高度,被人盛赞闪烁着“思想的闪电”。这说明,从短诗走向长诗,柯仲平的诗歌进入了更为广袤、开阔的精神地带。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复杂,也许是因为诗人觉得,面对越来越丰富的战争生活,用狭窄而过于纯粹的抒情短诗去表现是无力的,所以做出了及时决绝的调整。这同时也说明,作为一种文体,诗歌具有含蓄简洁等诸多的优势,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比如,在对生活经验的占有和表达上,在对复杂事件的处理方面,诗歌可能不如小说、戏剧乃至散文。诗歌若想获得持续性的发展,只有打破自身局限,向叙事文体的技巧大胆扩张与借鉴,以缓解诗歌文体本身的压力。这或许也是1990年代以来叙事诗愈来愈成为诗歌界的“显词”,成为诗人们将叙事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一种基本手段的深层原因所在。

“狂飙诗人”柯仲平又经常被称为“大众诗人”。柯仲平的创作总能根据现实变幻而调整艺术风格,但有一点却是变中之常,那就是一直以读者为上,不仅积极表现群众生活,而且注重诗歌表达的明白晓畅,努力寻求和大众契合的可能。他从小常有和苗族、瑶族、彝族等兄弟民族的人民相处。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认识和情感,影响了他的诗歌观念。他把民歌体作为借鉴资源,从民歌的语言、形象、节奏、比兴手法中汲取营养,以容易被读者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因此,他的诗歌常常朗朗上口,充满节奏感。如《边区自卫军》发表后,汉学家彼德洛夫评价甚高,称“柯仲平把中国古典诗歌和民间歌谣结合得很成功,是东方色彩的杰作”。这段评价还是比较准确的,如诗开头一段:“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一条川在两条山间转/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弯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黄河心不甘……”当时就被音乐家谱成歌曲,在抗战前方和后方传唱,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情绪饱满、语言通俗和浓郁的民歌味道。再如记述游击队在马家村袭击日本一个联队故事的73行的小长诗《游击队像猫头鹰》,全诗9节,用词注重反复,首尾回环呼应。其中那段景物描写是这样的:“快到三更,快到三更,/除了微微的风声/满天星星,透过森林,/闪着眼睛,闪着眼睛;/静悄悄的,静悄悄的/等待着袭击的命令;/忽然间,忽然间有鸟鸣三声——”有人说它“密集的重复如耳语,带来一种时间的延伸感,酝酿着一触即发的紧张感”。整个诗里无一玄虚晦涩之词,其中的语言哪个农民、游击队员都能听得懂,但却非常有表现力。

诗有多种,像卞之琳、穆旦等人,创造了一种颇具现代性的诗歌,既美又玄,但一般读者读了可能会比较难理解;也有戴望舒、田间似的返璞归真的诗,他们的诗朴素本色、直指人心,当然有时也潜伏着过于明白的陷阱。我觉得当下诗坛需要卞之琳、冯至、穆旦,也需要戴望舒、田间、柯仲平。多种诗风能够并行发展,互补共荣,诗坛才会不断繁荣。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

柯仲平诗歌创作的启示

□罗振亚

传承优秀文化 勇担引领时代风尚的社会责任

(上接第1版)

陈平原的演讲以“散文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为题,阐述了散文在中华文脉赅续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谈到,在常见的文学体裁中,散文最难与国际接轨,对于什么是散文以及散文的边界、魅力与发展前景,学界也尚无共识。在他看来,散文不一定只以叙事或抒情为主,还可以以议论为中心。他介绍了自己在编选“漫说文化丛书”正编与续编时的谋篇布局,认为若能以史家眼光去广泛阅读,提炼精彩的主题、开掘深刻的意旨、捕捉辽阔的视野,采用合适的编选策略,散文同样可以和小说、诗歌一样,“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

包华石从中外绘画的构图方式之演变切入,分析了绘画艺术与现实社会间的映射关系。他表示,绘画构图方式的变革反映了时代和社会观念的变革,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学和绘画中对国家和人民的阐述。

“为什么要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现代生活?因为生活需要有足够的文化力量来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力量。走进生活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播途径,只有活在人们的生

活中,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创新发展。”蒙曼认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生活,就是要把资源创造性地调动起来,制造成产品,画成画、唱成歌、做成美食,在回应日常需求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创新。“古人云,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落脚点就在生活中,未来也就在生活中。”

在当天下午的圆桌对话环节中,嘉宾们分别围绕“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文艺精品与中国叙事”“文艺精品与媒介传播”展开了三场对话交流,就如何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真知灼见,对如何用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进行了详细阐述,对文艺精品的评判标准、创作经验、传播渠道等进行了深入剖析,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坛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广播电视全媒体发展报告(2023)》、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形象推介、“艺术院团2023至2024年度剧目”、《2022北京文艺发展报告》,签约了“LED虚拟拍摄应用技术研究联合实验室”、“青年文化大数据总部基地暨青春元宇宙之家建设”、“十月·昆明书院”公共文学艺术空间运营、电视剧《向水而生》等项目。

让更多国外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学的魅力

(上接第1版)

在刘庆邦看来,文本的价值需要通过阅读来实现,“我们的写作虽然不是对象化的、不是盯着某个群体来写的,但我们心里要有读者,要尊重读者”。如今中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希望有更多外国读者能感受到中国文学的魅力。

梁晓声谈到,自上世纪初以降,国内热衷于翻译和引进外国作品,作家们多从外国作品中汲取营养,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并不比同时期的外国文学差。“外国读者对我们的认知几乎等于0,很多人对中国文学并不了解,甚至有许多误解。”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文学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需要多方面共同协作,探索更便捷、更有效的方式方法,去推动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杜布阔娃·奥莉卡说,大家应该

努力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用实际行动去改变国外对中国人的想法,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美好未来。

“我当翻译10年了,最近几年亲眼看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果越来越多,国外对中国文学越来越重视。”施露表示,自己将继续努力,锲而不舍,向世界推介更多中国的优秀作品。她还希望国内外的作家、翻译、出版社和版权经纪人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向世界介绍中国好书。

“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多角度地呈现中国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图景,如何在中国文学中体现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如何在共性和保留中华民族的美学个性和文化精髓,这都是中国文学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题。”施战军表示,文学是一种世界语言,希望能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罗建森)